

#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8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8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 目 录

复辟的形形色色.....	溥 仪(1)
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之经过及其内幕 .....	叶恭绰(28)
关于南北和议事复叶遐庵.....	朱启钤(52)
我之上海会议观为叶遐庵作.....	章士钊(55)
刘建藩零陵独立前后 .....	仇 鳌(63)
一九一八年北洋军对湘作战经过.....	张联棻(80)
安福系的形成及其内幕 .....	刘振生(95)
关于徐树铮和安福俱乐部 .....	刘冰天(101)
我所了解的段祺瑞 .....	邓汉祥(107)
谈袁克定 .....	恽宝惠(122)
醇亲王府的生活 .....	溥 杰(125)
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续一)	
.....	王芸生 曹谷冰(181)

## 附注

对《醇亲王府的生活》一文的订正见《选辑》第三十四辑

# 复辟的形形色色<sup>\*</sup>

溥 仪

## 一 在袁世凯时代

幼年时代，在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候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时是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或者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在我的回忆中，“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袁世凯吃饭了。”在我身旁的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比皇上还神气！”

张谦和的光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忿忿然的神情。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已经能够从他的词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在当时的年岁上，我可以从“响城”的各种音响上想象传说中的街道是什么样，叫卖的小贩如何站在我想象出的舞台上表演他的噪音，大兵们又如何想用歌声压过小贩的叫卖……它把我带进了一幅引人入胜的城厢生活的图画，也把我引入耻辱难忍的想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桌上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煽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使我想象的翅膀飞得更高；陈老师（陈宝琛）给我讲的同治“中兴”、康

---

\* 编者注：这是作者所写长篇稿件《我的前半生》中的一章。

乾盛世等等景象是构成想象的主要材料。这种音响不是我站在养心殿的宫院里而是在毓庆宫从老师的嘴里听来的。那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旧臣们的话说,就是“光复旧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sup>①</sup>,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sup>②</sup>,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伪“满州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心灵的指导去活动。在我童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和由内务府大臣世续得民国总统同意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我也这样称呼他)。这些谨慎而稳重的人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来滑稽,但是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的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个理想的人,正是引起紫禁城忿忿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照我的理解,这种幻想是从袁世凯为隆裕太后治丧开始的。在那些日子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太后在世时,宫里总是阴阴郁郁的,好像祸事随时都会降临的样子。每天我向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云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

大批太监逃亡的事跟着发生了。因为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一包围,全都活不成了。张谦和也成天叨念这些事,免不了又

---

① 丁巳事件即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

② 甲子阴谋是一九二四年故宫博物院将金梁、康有为等活动复辟的文件印行出版,书名《甲子复辟阴谋文证》。

露出忿忿然的神色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到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不过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帐外替我念书<sup>①</sup>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了。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在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一落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然后说：

“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的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也用不着说话，内务府大臣绍英就全代办了，我只坐在乾清宫龙书案后头宝座上看着便是。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了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了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两侧站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是朱启钤，他一进殿，在门口那里向我鞠了一个躬，向前又鞠了一躬，走到我的台前又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朗诵“大中华民国大总统敬向大清皇帝问好，……”的贺词。内务府大臣绍英走到我的台上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木匣子里取出答辞交给他，他站在台上向朱启钤念了一遍，又跪着交还给我。朱启钤又向我鞠躬后退，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我就发现了气氛的变化：首先是我的卧室床旁又出现了张谦和的朗朗念书声，其次是毓庆宫里陈师傅对我微笑着捻那乱成一团的白胡子，摇头晃脑地说：“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

过了阳历元旦，不久，到了我的生日（正月十四日，因为和道光皇帝的忌辰是一天，改为十三日）。这天，大总统袁世凯又派了专使

---

<sup>①</sup> 为了帮我记忆，太后规定：每天在我起床前，由张谦和替我把昨天念的书朗诵一遍。

到乾清宫向我致贺词，于是在民国元年间几乎已经消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上了蟒袍补褂，红顶花翎，出现在神武门前和紫禁城内。……在民国元年回到宫里来的大多数在进城前穿着便服，进了城才换上袍褂，顶戴花翎。……现在他们经过阳历元旦一场演出的启示，又敢于明目张胆地穿戴齐全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落日城中繁华气象的，是隆裕太后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隆裕寿日是三月十五日，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的那天，袁世凯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又来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袁世凯另又派国务卿赵秉钧率领了全体公务员以外国使节之礼来祝贺。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动人：他自己臂缠黑纱致哀，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又出动了全体公务员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员吴景濂主祭；军界举行了所谓全国陆军哀悼大会，领衔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将军段祺瑞。在太监干嚎的举哀声中，我看见了夹杂在玄色袍褂中的民国大礼服，看见陈师傅下巴的白胡子团得更乱，父亲脑后的花翎更加跳动，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让他们感到新的希望的还有另一个因素，是太傅徐世昌也从青岛赶来了，接受了清室赏戴双眼花翎。徐世昌在颁布退位后带着一根辫子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寓公，起了一个含意双关的别号“东海”。他这次出现的意义，我在下文中还要谈到。

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讨袁运动，即所谓的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争就以袁世凯的胜利而结束。袁世凯接着用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后，给我写了一个报告：

“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兹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团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经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两稔于兹，深虞陨越。今幸内乱已平，

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统一，友邦皆已承认，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而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惟有薰督国民，革新郅治，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十九日 袁世凯”

由于这一连串的现象，遗老们中间便起了各种议论。

“袁世凯究竟是不是曹操？”

“项城当年和徐冯段说过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冯段才答应退位的主意。也许这就是智取？”

“我早说那个优待条件里的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逊位，袁官保单要改成个辞位呢？辞者，暂别之谓也。”

“大总统常说办共和，办的怎样。既然是办，就是试行的意思。”

不管怎样猜测，遗老们有不少人反正是越来越兴奋了。这年冬天，在光绪和隆裕奉安的时候，梁格庄的灵棚里演出了一出活剧。主演的是那位最善表情的梁鼎芬，那时他还未到宫中当我的师傅；配角是另一自命孤臣的劳乃宣，是宣统三年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学部大臣，辛亥后也躲到青岛，在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设的“尊孔文社”主持社务。在这出戏里被当作小丑来捉弄的是前清的山东巡抚，袁政府里的国务员孙宝琦，这时他刚当上外交总长（他父亲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光时代的名臣之一）。那天这一批国务员由赵秉钧率领来致祭，在致祭前赵秉钧是先脱下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三跪九叩的礼。这又给孤臣孽子梁鼎芬觉出了气·候，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些没带清朝袍褂来的国务员之中，叫他一眼看中了孙宝琦。他直奔这位穿大礼服只鞠躬的国务员的面前，指着鼻子问：

“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孙宝琦给这位老朋友问怔着了，旁边的人也都转过头来向这边。梁鼎芬接着更提高嗓门说下去：

“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他们俩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个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

“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梁师傅后来给我描绘得有声有色。这个故事和后来的“结庐守松”和“正颜退刺客”，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事迹，讲了不知多少次，而且越讲情节越完整，故事越富于传奇性。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让孤臣孽子兴奋的事情越加多了。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等等举动，令人眼花缭乱。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陈师傅称之为贰臣，他自己却自言自语地宣称道：“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当局也不为怪。于是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写出了正续两篇《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了。他写了信给徐世昌让徐代向袁世凯去游说。这时清室太保徐世昌同时又成了民国政府的国务卿。徐把劳乃宣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让他到北京作参议。这样一来，又有了一位前清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一位国史馆协修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要投复辟之机了。

紫禁城里搬家的事根本不提了。谨慎稳健的内务府大臣世续为了把事情弄牢靠些，找了他的把兄弟袁世凯一次。袁说：

“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还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

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住，能叫谁住？”

这是很久以后在内务府作过事的一位遗少告诉我的。当时世续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谈这类事情，要谈的也要经过陈师傅。照师傅当时的说法，“看样子他们总统，倒是优待大清的。优待条件本在盟府，为各国所承认的。……”

师傅的话，好像总是没有说完全。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颇有见地的“慎重态度”，和紫禁城外的劳乃宣那些遗老比起来，紫禁城里在这段时期所表现的乐观确实是谨慎而有保留的。袁世凯的种种举动——从公开的不忘隆裕“在天之灵”到认定“皇上”不能离开皇宫和太庙，这固然给了紫禁城的人不少幻想，但是紫禁城从“袁官保”这里所看到的也就只限于此，所生的幻想也还是一相情愿的多。何况在醇王兄弟们心里更不相信袁世凯会捐弃旧嫌，因此，紫禁城就不能表示出太多的兴奋。后来不久，当复辟年到了年底，北京开始变风头的时候，事实证明这种“审慎”的态度更是完全必要的了。

风头的变换，是由一个肃政史提出要追查复辟传闻开的头。袁世凯把这一案批交民政部“查明办理”，接着演讲过还政于清的宋育仁被步军统领衙门（等于警备司令部）递解回籍。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不少人恐慌了，劝进文章和还政于清的言论都不见了。在青岛正准备来京赴任的劳乃宣也不敢来了。但这时人们还有些惶惑不解，因为袁世凯在查办复辟的民政部呈文上又批上了“严禁复辟谣言，既往不究”这种奇怪的话。而宋育仁的递解也很别致：袁世凯送了他三千块大洋，一路上又大受各衙门的酒宴欢送，叫人弄不清宋育仁到底是受罚还是受奖。一直到民国四年，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一篇说是共和制不适中国国情的文章，继而又有筹安会出现主张推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才扫清了满天疑云，使人们明白了袁世凯要复的什么辟。

事情已经清楚，而紫禁城的恐怖和愤激也一齐发生了。我从响城中听见袁世凯乐队奏乐，就是在这时候。那几天，三大殿（太和、

中和、保和三殿，辛亥后属民国所有)进行油缮，在养心殿院子里可以看见油缮工的脚手架，张谦和告诉我，那是袁世凯要在三大殿登极。

不论是谁，只要在院子里行走，都要关心地向那边张望一下，想看出附近工程进行的情况，好像自己的命运就决定在工程的结束上似的。太妃们每天都要烧香拜佛，求大清的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的保佑。仪仗是忙不迭地让溥伦搬走了，玉玺因为是满汉合璧的，并不合乎袁世凯的需要(历史上出名的和氏璧在清朝不用作玉玺，而是当做古董玩赏了)，倒是一块也没有拿去。事实上如果袁世凯说一声全要，交泰殿的所有“御玺”也会乖乖地交出去，因为太妃她们早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这种空气的重压，特别可以从太监们的神色上感觉出来。早晨我卧室内的背书声不用说又低沉了，御前小太监们也常常交头接耳，有时竟神不守舍地传说着：

“太和殿油漆完了！”

毓庆宫有了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师傅们对毓崇特别和气，没有人再拿他当“伯禽”看来待。毓崇在太妃那里也成了红人，常常被叫进去赏赐些鼻烟壶、搬指之类的玩艺儿。当我说话一提到袁世凯，师傅就向我递眼色，我就赶紧改嘴，以免让毓崇听见传到他父亲溥伦耳朵里去。

有一天，毓崇又高高兴兴地应召到太妃那里去了，陈宝琛看见窗外已经没有他的影子，从怀里拿出了一张纸条，秘密地对我说：

“这是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

我拿过来，看见这一行字：

“我仇有疾，不我能疾，吉！”

他解释说，这是说我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我，是个吉卦。他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结果一切都是吉利的，说我可大大放心。这位老夫子为了我的命运原来把原始社会的一切算命办法都用过了。我因此大受感动，也大受安慰。陈老师傅还摇头摆脑地说：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憨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不我能疾，不我能疾，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疾于我乎？”

为了“不我能疾”和保住优待条件，师傅、王爷和内务府大臣们除卜卦之外所进行的活动，他们虽没有告诉我，我也知道了。他们和袁世凯谈了一笔交易，总起来说，就是由清室表示拥护袁皇帝，袁皇帝承认优待条件。内务府给袁一个正式公文说：“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这个文换回来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应当列入宪法。袁世凯乙卯孟冬。”

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后来都见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大总统令”中。这个令发表的一个月前，我父亲日记里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初十日（即阳历十一月十六日）：上门（意为到紫禁城）偕世太傅见四皇贵妃，稟商皇室与袁大总统结亲事宜，均承认可，命即引一切云。在内观看秘件，告安，一切如恒云云。”

所谓秘件，就是袁世凯在优待条件上手写的跋语。所谓亲事，是袁世凯叫江朝宗向我父亲同世续提出的，太妃们心里不愿意，可是也不得不从。其结果，自然优待条件没列入宪法，我也没当上袁家的女婿，因为袁世凯作了八十几天的皇帝就下了台，不久也就气死了。

## 二 丁巳复辟

袁世凯去世的那天，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遇见了大事。太监们奔走相告，太妃们去“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像前烧香，毓庆宫无形中停了一天课。……

接着紫禁城中就听见了一种新的“响城”声：

“袁世凯失败，就在动了鸠占鹊巢之念。”

“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是旧主”。

“袁世凯与拿破仑三世不同，他并不如拿氏有祖荫可恃。”

“叫姓袁的当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呢。”

……

这些声音，和师傅们说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话形成共鸣。

我的思想感情这时和头几年已大有不同了。这年之初，我刚在奕劻滥法问题上表现了“成绩”，这时候，我又对报纸发生了兴趣。

袁世凯死了不多天之后，报上有了“宗社党起事未成”，“满蒙匪势猖獗”的消息。这是肃亲王善耆这些人所谓勤王年的活动起来了。当初公开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伟、升允、铁良被称作四个申包胥的，哭秦庭都没成功，后来除了铁良躲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其余的都住在日本租界地旅顺、大连，仍然通过手下的日本浪人勾结日本的军阀财阀，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其中最活跃的是善耆，在他任民政部尚书任上，他的警政顾问的川岛浪速跟他在一起，给他跑合拉纤。日本财主大仓喜八郎男爵给他拿出活动费一百万日圆。日本军人有森、土井等人给他招募满蒙武装，编练军队，居然也有了好几千人。袁世凯一死，就闹起来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人巴布扎布率领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最后以巴布扎布本人被部下刺杀告终结。在闹的最凶的那些天，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勤王军”和民国的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正打得热闹，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紫禁城从袁世凯死后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们失败的影响。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紫禁城派了那个曾向袁世凯劝进过的溥伦前去祝贺，黎派了代表来答谢。民国政

府又把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送回到紫禁城。元旦和我生日，大总统的礼官和民国的大官又来祝贺。我父亲也向黎总统、段总理赠送饷饩。内务府比以前忙多了。拟旨赐谥法，赏朝马、二人肩舆、花翎顶戴，要授什么南书房行走、乾清门各等侍卫，带领秀女供太妃挑选，也偷偷地收留下优待条件所禁止的新太监。当然还有我所无从了解的多种交际应酬，由个别的私宴到对国会议员们的公宴。……

总之紫禁城又活跃起来了。到了丁巳年（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张勋进宫请安这天，就开始出现了高潮。

在这以前，我亲自召见请安的人还不多，也大都限于满族。我每天的活动除了到毓庆宫念书，在养心殿看看报，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游戏。我看见神武门那边翎顶袍褂多起来了，觉着高兴；听说勤王军发动了，尤其兴奋，而勤王军消灭了，也感到泄气。但总的说来，我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忘掉。听说肃亲王逃亡旅大，消息不明，未免给他担心，可是一看见骆驼打喷嚏很好玩，肃亲王的安危就扔到脑后去了。既然有“王爷”和师傅大臣们在，我又何必操那么多的心呢？到了事情由师傅告诉我的时候，那一准是一切都商议妥贴了。

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宫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齐走进了毓庆宫，不落座就由陈师傅先开口：“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大臣来给皇上请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请示的。”

“谁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

“张勋？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宣武军张勋吗？”

“正是，正是，”梁鼎芬赞许地点头，“皇上记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勋。”梁师傅向来不错过颂扬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记忆，只不过前不久才听师傅们说起这个张勋的故事。自从民国以来，张勋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辫子。袁世凯在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以辫子兵攻陷南京而大功

告成。辫子兵在南京大抢大烧，误伤了日本领事馆的人，惹起日本人的抗议，辫帅赶忙到日本领事面前陪礼道歉，赔偿一切损失，才算了事。这些事是我后来从报上看到的。当时从师傅口中只知道这位旧臣的“忠勇”，知道了他在隆裕死后通电吊唁称为“国丧”，还说了“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的话。袁世凯死了不久，报上登过张勋的一封公电，我也记得，这件公电说的是徐州的督军会议对时局的态度，头一条是“尊重优待清室各条”。总之，我相信他是个忠臣，愿意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

按清朝规矩，皇帝召见大臣时，无关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凡是召见外来的不经常见的人的时候，师傅总要先教导一番，告诉我应该说些什么话。这次陈师傅用特别认真的神气告诉我，要夸赞张勋的忠心，叫我记住他现在是长江巡阅使，有六十营的军队在徐州、兖州一带，可以问问他徐、兖和军队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对他很关心。末了，陈师傅再三嘱咐说：

“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皇上切记，一定要以谦逊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

“满招损，谦受益。”梁师傅又补充说，

“越谦逊，越是圣明。上次陆荣廷觐见天颜，就称颂圣德。……”

陆荣廷是两广巡阅使，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赏赐紫禁城骑马的民国将领。两个月前他来北京会晤段祺瑞，不知为什么，他到宫里来给我请了安，又报效崇陵植树一万元。在回养心殿的轿里，我忽然想起了那次陆荣廷觐见时师傅们的神色和对我的谆谆教诲，是和这次一样的。那次陆荣廷的出现，好像是紫禁城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内务府和师傅们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赏赐，有我写的所谓御笔福寿字各一张和对联一副，有无量寿金佛一龕，三镶玉如意一柄，玉陈设二件和尺头四件。陆荣廷走后来了一封信请世续“代奏叩谢天恩”。从那时起，“南陆北张”就成了上自师傅下至太监常提的话头。张谦和就说过：“有了南陆北张两位忠臣，大清有望了。”

在轿子里，我根据太监给我买的那些各种石印画报中就去设想张勋的模样，到下轿的时候，他在我脑子里也没成型。进养心殿不久，他就来了，我坐在宝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头。

“臣张勋跪请皇上圣安……”

我按着陈师傅的教导，问了他徐、兗地方和他的军队情形。问的目的也不是真想得到什么答案，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张勋穿一件纱袍褂，黑红脸，两道浓眉，胖呼呼的，看他似乎太短的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有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也注意到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条。

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判，他见我问了他许多的事，他果然对我恭维起来了。

他说：“皇上真是天亶聪明！”

我说：“我差得很远，我年青，知道的事也少。”

他说：“那么，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基呀！”

我说：“我哪敢比圣祖，那我可差的太多太多了。……”

这次召见并不比一般的时间长，他也不过坐了五六分钟就走了。我觉得他有点硬转（音跬 zhuǎi）文，显得比师傅们粗鲁，大概不会比得上曾国藩，也就觉不到特别高兴。可是，第二天陈宝琛、梁鼎芬见了我，笑眯眯地说张勋夸我聪明谦逊，我听了这话，又得意起来了。至于张勋为什么要来请安，师傅们为什么显得比陆荣廷来的那次更高兴，内务府准备的赏赐为什么比对陆更丰富，太妃们为什么还赏赐了酒席等等，这些问题，我连想也没有想到。

过了半个月，阴历五月十三这天，又是在毓庆宫，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齐出现，面色都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口：

“张勋一早就来了……”

“他又请安来啦？”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贴，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



清复辟啦！”

他看见我在发怔，又赶紧说：“请皇上务必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子人归。”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我呆呆地看着陈师傅，希望他多说几句，好明白得多些，我该怎么当这个“真皇帝”。

“用不着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了。”陈师傅又提醒我：“不过不要立刻答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我又回到养心殿召见了张勋。这次张勋说的和他的吁请复辟折上说的差不多，只不过不像奏折说的那么斯文就是了。

“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的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他念叨完了，我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他又夸我一顿，又把康熙皇帝六岁作皇帝的话搬出来。听他叨叨着，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

“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就行了。”

“唔……”我虽然还不明白，心想反正是师傅们必是商议好了，现在我该着结束这次召见了，就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我又算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了。

张勋下去以后，陆续地有成批的人来给我磕头，有的请安，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然后又有奏事处太监拿来了写好的一堆“上谕”。头一天一气就下了八道“上谕”：

一、即位诏；

二、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

三、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着照常供职；

四、授七个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和两个内阁阁丞（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拭和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